

导 言

2020 年伊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为应对这一罕见的大流行病给公共卫生、经济、社会与国际关系带来的挑战，世界各国都依据各自国情，采取了不同的防控举措。为了厘清各国抗疫的思路、机制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联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单位共同开启了“博雅德信工作坊：外交官眼中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系列线上研讨会。

德国是欧洲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疫情已造成德国逾 11 万人感染，超过 2000 人死亡，专家预计最终将有 60% 的德国人感染新冠病毒；德国多地出台禁足令，企业停工、学校停课，预计将会使得德国经济总量缩水 7%-11%；疫情对医疗系统的压力以及对公共生活的限制，侵扰了社会正常秩序；而欧洲各国在疫情管控下纷纷封锁边界、争夺防疫物资，又给欧盟的前景蒙上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之称为德国自二战以来的最大挑战。

纵观全球疫情防控，德国的防控措施与中国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是什么促使德国政府作出相应的防疫决策？德国在防控方面有哪些得与失？面对更为严峻的疫情形势，德国应采取哪些措施加以应对？在国际格局的宏观层面，疫情将会对中德、中欧与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本期工作坊邀请到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主任郑志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董小英等 4 位专家学者从政

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公共卫生等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讨。

“博雅工作坊”第29工作间

外交官眼中的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一）：德国

2020年4月15日

本期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主持。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史明德首先做主旨报告。他梳理了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全球性影响，认为疫情很可能使整个世界陷入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的全面危机。这一影响剧烈、深刻、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会加速百年之大变局由量变转向质变，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今后国际格局、国际关系、国际秩序有可能以疫情为分水岭，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当然，疫情前后两个时期并不是割裂的，疫情前许多变化和趋势已经存在，此次疫情只是催化了这种变化。

当前的核心问题在于，疫情之后世界会向何处发展？中国又将向何处发展？未来会有更多的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更多的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更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和合作共赢？从长远看，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因此，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很可能是全球化受挫时期或者曲折时期，在一段时间内更多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会上升。目前各国在集中精力应对疫情的同时已经开始思考和调整各自对内和对外的战略，中国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史明德大使指出，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首先，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兴盛，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改变，反而借疫情加速实施。全面遏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各党派和社会的共识。中美关系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今后肯定是竞争大于合作。中美的世纪博弈已经开始，还会更加尖锐，中国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人们常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现在好不到哪去已经证实了，坏到什么地方就很难说了。

美国的疫情仍在发展，可能陷入全面内外危机，美国必将利用疫情转嫁危机，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将矛头对准中国。如果美国困难增加、危机继续深化，可能会给中国制造更多麻烦，甚至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上铤而走险。今后美国可能使用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军事等手段来打压中国，维护其全球地位，并且不会顾忌国际舆论和道德准则。

中美之争说到底是一条道路、两种制度的争论。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不仅是美国综合实力的最大竞争者，更是意识形态的首要对手。因此美国对华遏制是瞄准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上层建筑等，同时美国将继续坚持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渲染各国对中国的依赖，试图改变全球产业链，加速与中国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脱钩。这方面国内尽管有不同看法，但我们一定要有底线思维，尽早制定应对之策。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博弈必将影响今后国际关系的走向。中美能不能合作，是更多的合作还是更多的竞争和冲突，对整个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都将有深刻的影响。

其次，**疫情将严重冲击全球经济。**今年全球经济衰退已

成定局，这是大家的共识；但世界是否会进入大萧条的危机中，则存在不同看法。从年初到现在，各个国际机构对经济形势的预测不断下调，但目前仍难下定论，实际如何取决于整个疫情的发展。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年所面临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肯定会恶化，明年是否反弹不好说，全球经济趋势值得持续关注。

第三，中国要警惕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新调整。疫情进一步蔓延有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各个经济体现在都是内顾为主，争相出台限制其他国家的政策，推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从长远看全球化不可逆转，但近期发生产业链脱节是非常可能的。疫情在中国爆发时已经导致了全球供应链暂时脱节。随着疫情中心向欧美等主要经济体蔓延，各国都采取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全球产业链可能受到更大的冲击。德国在这方面比较明显。德国汽车行业50%-60%的零部件都由中国供应，两个多月的疫情导致中国对德汽车零配件供应中断，德国汽车产业无法维持生产。在中国复工复产后，德国的汽车生产仍处于全面停工，此外，中国高铁等行业都需要德国原装的设备和技术，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正在利用《国防生产法》和疫情给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困难，加紧推行对华脱钩战略，鼓动或者强迫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回归美国；同时它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华依赖，寻找新的替代供应商。这在科技领域非常明显，华为5G问题仍旧没有放松。美国已经大大限制了中国对美国的科技投资，美国对华科技投资从2017年也已经归零，科技领域的局部

脱钩在所难免。

疫情带来的冲击一方面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很多国家意识到自身对中国的依赖大大增加，所以他们也开始从所谓国家安全的角度重新思考调整供应链。疫情前这种情况就已出现，美国商会去年3月的一份调查已经证明了2/3的美国在华企业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1/4的企业考虑延缓对华投资，1/5的企业准备将生产线移出中国。而近期，日本出台的经济复苏计划准备拿出150亿人民币支持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国移到其他地方；4月8日，德国内阁决定重新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阻止外国企业和政府利用疫情加快收购德国和欧洲的资产，该法案两年之内已修改三次，虽没有指明国家，但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因此，对于贸易链和供应链的问题中国必须有充分预判。

史明德大使随后介绍了欧洲的防疫情况。他认为，英国脱欧、政党碎片化、社会空前分裂、经济不景气、东欧国家离心力加大等在疫情前就困扰着欧盟的问题，在疫情爆发后更加突出，导致欧盟新老问题交织、内外风险叠加。

一是欧洲内部结构矛盾再次暴露无遗。欧洲一些国家不仅对意大利、西班牙见死不救，而且全力封锁和查封医疗用品，各国相继封闭边界，政策没有协调。欧盟国家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问题非常突出，在危难时期非但没有团结，还损人利己。这样的做法使欧盟在整个国际上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同时使原来民众对欧盟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欧洲南北和东西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二是欧洲团结自主的意识在危机中有所加强。一方面，欧洲一些国家利用地缘政治和疫情攻击中国和俄罗斯，另一方面亡羊补牢，强调同舟共济，德法等国向受灾国提供援助。然而，3月26日欧洲议会讨论疫情时很多议员称欧洲的团结到目前为止是一句空话，实践中没有体会到，这种内心的创伤是难以弥补的，这在疫情中和疫情过后都会产生影响。

三是欧洲经济遭受重创。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财长均表示本国经济出现了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最新估计欧盟今年GDP将萎缩7.8%，损失超过1万亿欧元。为此，欧盟推出了2.8亿欧元的经济援助方案，启动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免责条款，但欧元区各国没有在是否发行新冠债券问题上达成一致。欧盟国家既有团结一致的地方，但当牵扯到根本经济利益时就会产生分歧。

四是美欧关系的裂痕因疫情再次扩大。疫情前，美欧在移民、贸易、政治、伊核等问题上渐行渐远，疫情发生后欧洲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失望进一步加深。美国不经协商早早切断了与欧洲的往来，同时与欧洲抢夺紧缺医疗物资，不惜花重金收购德国的检测公司，遭到德国的强烈抵制。但同时也应看到，无论当前欧美怎么争论，上述问题仍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并没有到分道扬镳的地步。欧洲人心中还存有侥幸，寄希望于某天美国总统易人后重归于好。欧洲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加强是一种变化，但不应过高地估计这种变化。

疫情前欧洲内部已经就如何再认识中国进行了讨论，反映出三个核心观点：

再认识中国的“天真论”。“天真论”是指，过去欧洲认

为中国改革开放必然会跟西方的制度趋同。但实践发展证明，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中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这种“天真论”应该被抛弃。

再认识中国的“挑战论”。中国在经济、科技、制度等方面都对欧洲形成了很大挑战。其中欧洲最害怕的是中国的制度，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在全球越来越大，相较而言欧洲的价值观影响则在下降。因此，欧洲人认为难以应对中国的经济、综合国力与制度相结合所产生的动力和影响。欧盟不久前出台的对华政策文件中对中国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多边领域的合作伙伴；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技术经济领域的竞争者；治理模式的制度性对手。

再认识中国的“夹心论”。很多欧洲智库称，未来世界很可能是中美两极的世界，欧洲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既不愿选边站队，又处于极大的困难当中。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欧洲就处于两难境地。而疫情期间中美两国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欧洲该怎样做，又怎样解释自己的政策？比如“禁足”，虽然做法上与中国是一致的，但却必须在解释上不一致。中美博弈的加剧，会使欧洲的处境更加困难。

中国刚爆发疫情时德国还是在隔岸观火，既有同情的一面，也有幸灾乐祸的一面。在美国幕后推动下，很多政界和舆论借疫情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攻击中国采取的措施，然而，随着欧洲疫情的爆发和美国单边主义的加剧，欧洲在疫情中对中国的认识都在发生着变化：

首先，欧洲意识到全球化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大家都是利益攸关者，都是利益捆绑者，都是命运共同体，任何一国

都不能独善其身。

其次，欧洲切身感受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重要性，欧洲与中国息息相关。在药物和防护设备等医疗资源方面，欧洲完全依赖中国，这种依赖性远远超出了他们此前的想象。为此，欧洲开始进行战略调整，加强欧洲的主权和安全，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默克尔和马克龙都提出了现在就要着眼“疫后时代”，重建经济独立和产业主权。欧盟呼吁成员国加强外资审查，保护战略性资产和技术。一些大规模重建及救助计划被提出，在考虑应对当前疫情的同时，着眼疫后重建，并且开始对非洲进行援助。

史明德大使着重分析了德国的防疫措施以及疫情对中德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德国于1月27日出现首个确诊病例，疫情随后在2月的狂欢节大爆发，截至4月13日德国累计确诊感染病例12.5万人，死亡2969人。德国的死亡率不到1%，超过一半感染者被治愈，在欧洲国家中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德国应对疫情的办法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中国，在欧洲国家中非常突出，有以下几点值得研究：

德国的卫生医疗体系非常完善，医疗设备、技术、物资全球领先，人均占有率非常高。德国有2.8万多个重症监护病床，是法国的4倍、意大利的5倍、英国的7倍，呼吸机人均占有量是很多国家的10倍以上。德国病毒检测能力很强，每天可以检测10万人，且全国20多个实验室分布非常均衡，就近检测非常便利，因此数据比较可靠，也比较及时。对于疫情，德国采取分流和重症优先的救治思路。目前德国重症病房占有率只有58%，仍有8000多张重症床位是空置的，

所以它现在也有能力接收来自法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的重症病人。德国注重保护高危人群。基于老龄化很高的情况，德国一开始就将老年人作为主要的保护重点，把重点高危人群保护好，死亡率就很低。基于上述分析，目前可以说德国已处于较高水平的稳定阶段，下一步疫情会如何发展很难说。可以说，此次疫情是对德国治理医疗体系长期发展的一次大考。

不久前，德国外长马斯在谈到应对疫情经验时表示，中国和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是两个极端，不能成为欧洲的榜样。他还称，新冠病毒危机表明，不能简单认为一种社会制度优越于另一种社会制度。对于德国来说，虽然承认中国取得了抗疫的很大成就，但不能说出来，还必须说德国应有别于中国，这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德国表现的淋漓尽致。当然，中德两国之间在疫情应对的政治层面还是相互支持的，疫情爆发以来，双方领导人互通电话，强调双方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两国还及时互相提供物资援助。但同时，德国也开始调整产业，提出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一定要在本土生产，在医药方面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目前中德两国的合作因疫情影响受到很大冲击，一开始是德国的企业抱怨中国的产品到不了德国，影响他们的生产，现在他们更多的抱怨在华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人员、材料不能到位。目前德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再讨论、再认识和重新定位的阶段。默克尔对华政策一直持积极的态度，尤其在5G问题上坚持不将华为排除在德国电信市场外，对此她受到国内指责。对此，史明德大使指出，德国政界主张发展对华

关系的人士现在受到了空前压力，谁在公开场合说中国的好话就会受到围攻。那些此前持中立态度的人现在也开始转向，这其中除了德国本身意识形态因素外，美国的因素也无处不在。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在中德关系、中欧关系、欧洲对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点我们也要有充分的准备。

史明德大使强调，当前我们应认真研究形势，分析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既有很大的机遇，但是机遇之窗时间不会很长，同时也又很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脱钩”和“不脱钩”的问题。化解这个问题一是取决于外部环境条件，二是取决于中国自身，即思考如何展现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在美国退出多边机制的情况下强调多边主义，将欧洲作为工作重点。要强化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尽可能延迟和阻止脱钩的趋势和倾向，尽可能加大同欧洲国家的利益交织和融合，在疫情的应对中更多地突出合作。在宣传上不宜将中国宣传成救世主，不应将中国作为应对疫情的榜样，不应让他国来“抄中国的作业”。在应对疫情方面，各国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和传统理念不通，应对疫情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不能说中国是唯一正确的，否则可能适得其反。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最重要，如果中国能保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就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在危机时刻，我们要强调合作，强调共赢。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德国自我认识中的“夹心论”可以从德国文化的视角来考虑。德国知识界至今还有一个认识，即

德国是一个中间之国，经常被“夹”在两股势力之间，过去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后来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现在又在中美两国之间。对于德国舆论界和政界将抗疫政治化的问题，他认为德国有必要进行反思。

黄燎宇教授认为，此次德国的抗疫工作虽然被认为是成功的，但实际上德国一开始也走了弯路，由于多个层面的“轻敌”造成疫情汹涌爆发。在疫情扩散后，德国人意识到了危险，有短暂的一段时间从政府到民间都乱了阵脚：民众出现恐慌性采购，政府部门截留瑞士口罩，对意大利几乎没有提供帮助，默克尔第一次讲话甚至根本没有提到欧洲。尽管德国在“站稳脚跟”后开始发挥大国担当，派军机接回法国、意大利的病人到德国治疗，但这些行动没有解决欧盟内部的矛盾。

德国在国内采取的抗议对策是很到位的。首先领导人频繁发表讲话。总理默克尔在这段时间的讲话超过了她过去五年的全国讲话，而且讲话的内容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德国总统也出面发表讲话，且水平非常高。在风格上，德国领导人没有使用英雄主义的语言，反映出他们的基本价值。此外，德国的抗疫措施是刚柔并济的。一方面德国是民主社会，做事情要靠公民的责任感和自觉、理性，甚至靠个人的爱心，但另一方面，德国对疫情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巴伐利亚州两个重灾区，违反禁足令的罚款额度非常高，这也体现了它做事非常严谨的民族性。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主任、博雅讲席教授郑志杰从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及跨学科合作等角度对

德国疫情防控及全球疫情发展进行分析。

郑志杰教授认为，如何从单纯的国家政策、外交政策方面入手，实现对超越国境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治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要面对的全新领域，开展全球卫生外交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情况，他指出，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采取何种具体措施要由各个国家自己评定，但各国间应当相互学习、探讨防控的经验教训。

对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郑志杰教授认为，目前美国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诋毁、污名化，以及“甩锅”对全球卫生治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好担负起全球领导角色的准备，但在各国有难的时候中国仍义无反顾地提供支援和帮助。虽然一些国家的某些媒体不断诋毁中国所作的努力，但更多的国家对中国所持的肯定态度还是反应出中国在这场战斗中取得的成效。

郑志杰教授指出，过去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相对来说是比较缺失的。在世界卫生等全球领域，中国通常没有非常明确地把握好自己的诉求，世界卫生大会上很多时候甚至不作表态，对很多问题也没有太多涉及，期待政府部门在这些领域有所加强。一方面，加强包括中德关系在内的双边关系，拓展卫生合作；另一方面，在多边领域，发挥好政府作为国际卫生治理行为体的作用。通过这些努力，加强相关国际准则制定的话语权，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郑志杰教授表示，德国的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譬如非常完备的医疗卫生体系、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对此次疫

情的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是最早研制成功新冠病毒检测方法的国家之一，检测能力很强，覆盖面广。可能是存在语言方面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的联系相对较少，因此也很少将德国经验介绍给国内。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培养全球性人才，希望未来中国能拥有这样一批人才，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公共卫生、全球卫生的外交工作，推动中国全球卫生治理能力提升，也期待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能够发挥跨学科研究的作用，推动全球卫生外交人才的培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教授董小英从技术对经济的作用和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

董小英教授表示，疫情期间她一直在研究疫情发生初期的弱信号问题，对于危机管理来说，对早期弱信号的甄别、预判、管理和应对决定了该事件的最终走向和结果。目前全球危机事件有两种，一种是“灰犀牛”一种是“黑天鹅”。“灰犀牛”看上去傻傻笨笨，似乎不会对人有威胁，但如果它突然发力，就会令人猝不及防，可以说，此次疫情对于很多国家都是“灰犀牛”。因此，从管理学角度看，如何识别弱信号，并及时做出防范，值得人们研究。

疫情结束后全球短时期内会经历严重的经济下滑，中国要做好思想准备，也许要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从过去的经验看，实体经济比较强、有韧性的国家恢复较快，韧性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经济耐受力，二是重构能力，三是恢复能力。总得来看，那些基础较好、资金较充裕、

管理体系非常强健的国家恢复就快。疫情之后，科技竞争仍然会是全球经济竞争的一个制高点。现在中国的企业经过 30 年的积累和发展，要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甚至向科技密集型加速转化和升级。

从中国的发展趋势来说，目前正在推进两个重要的战略。首先是“新基建”，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铁公基”——铁路、公路和机场，主要在地面建基础设施，而现在“新基建”是以 5G 和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核心，在空中建信息高速公路，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17 年前，“非典”成就了中国第一批互联网企业，此次疫情以来，线上能力比较强的企业都恢复比较快，换个角度看，疫情给中国社会发展走向数字化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契机。第二个国家战略是推动技术要素市场化的发展。传统概念中经济发展的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和资本，但近年来国家提出要发展技术要素，表明它将成为未来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比如滴滴虽然涉及的是传统行业，但是它的技术要素是算法，这也是它的核心竞争力，技术要素将成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发展的关键。

德国在科技方面是中国很多企业的标杆，但德国自身也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人口老龄化严重，必须要多用自动化手段及机器人来代替人工。第二，虽然德国是全世界最先提出工业 4.0 的国家，比美国还早，但德国人口只有 8000 万，市场太小，所以必须以出口为导向。德国的制高点是科技，默克尔总理多次来中国就是希望能够将德国数字化技术与中国进行有效的结合，甚至输出到中国。中国制造业虽然体

量大，但实力并不突出，所以将来产业经济的科技化，中国和德国实际上有很多互补性的机会。不过，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展了很多对德国企业的并购，也让德国心生忧虑，担心自己的核心技术被掏空。

董小英教授认为，未来的竞争涉及国家或企业的 CPS (Cyber-PhysicalSystem) 的能力，即强调计算资源与物理资源间的紧密集成与深度协作。从未来发展态势来说，首先科技赋能是经济竞争新的制高点这一态势不会改变，其次，供应链仍是赢得竞争的重要基础。过去 40 年形成的供应链中，发达国家占据高端，发展中国家处于中低端，而此次疫情让很多发达国家认识到这中状态中的弊端，既不能自主可控，成本还高。因此，疫情会加速供应链的脱钩，这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就业问题。中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脱钩的成本，让它缓慢脱钩，或者不那么容易脱钩。第一，中国产业链非常全，全世界 500 多个工业品类我们都有；第二，通过数字化平台及工业互联网建设，中国的供应链效率比较高，脱钩的成本加大，企业舍不得离开；第三，中国市场大，这一资源将成为中国反脱钩的一个有力抓手。此外，从政府层面看，应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让已经在供应链上的各行为体争取留在中国。

董小英教授最后指出，除了通过科技赋能传统产业，优化中国供应链体系，我们还应该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把中国的环境建设好，让中国制度更加完善，应对危机的同事，抓住疫情后的发展契机。

互动环节中，与会嘉宾与现场听众就上述发言进行了讨

论。

提问：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现在中美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甚至似乎要走到对抗的地步，是因为中国方面脱离了“韬光养晦”策略。因此现在中国不仅要低调，而且还得好好表现，争取其他国家的理解。请问史大使对这种思潮有什么看法？

史明德：首先我们要看中国对美战略和美国对华战略。几十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都是非常清楚的：要合作，不要对抗，合则两益，斗则两败，并且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了极大的努力。中国现在没有要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的想法，中国对自己的实力有足够的估计，也很清楚在经济、科技、军事上总的实力与美国差别很大。但是中国的认识并不是美国的认识，我们不能由愿望代替现实。美国在“9·11”之前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可能成为美国最现实的竞争对手，“9·11”以后美国战略重点转移，后来又打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十几年过去了它发现精力都耗在打仗或者全球干预了，中国的实力则越来越强。此时美国对于如何对付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已经达成共识——不允许中国再发展了。如果美国在五六年之内阻止不了中国发展，美国就没有手段阻止中国，这是普遍的认识。所以这种变化不是我们向美国挑战，而是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变化的过程，只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一切都变得赤裸裸了。

遇到这种局面我们怎么做？我想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美强我弱的现实，这个现实之下中国要尽可能避免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自己的原则，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

题比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我们是绝对不能让的，而在某些领域则是可以让的，可以妥协的。中美贸易谈判谈了那么长时间，中国也做了很大让步，中国某些领域让步比美国大得多，这个对双方是有好处的。冲突加剧并不意味着中美会完全脱钩或者发生军事上的全面冲突，大家有足够的理智，但是局部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对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和封锁做好思想准备。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当今中美关系跟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没有相互关系的体系制度的斗争。中美在全球化的斗争中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明智的做法还是要合作。当然这个事情美国说了算，如果大家认识水平一致就好办了，但是非常遗憾，美国政府内部目前由鹰派主导，并且是达成共识的，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核心不会变。

对美国来说，一味让步意味着它就会步步紧逼，中国并不是要处处与美国对抗，但斗争是必要的，原则问题上也是必须要坚持的，但我们是有礼有节地斗争，是斗而不破，斗争的目的是谋求更大的发展，是寻求中国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空间。中美关系非常复杂，有时候矛盾是很激烈，同事我们也希望中欧关系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美国目前采取的单边主义、霸权行为引发了很多国家不满，但我们还是要坚持多边主义的，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多数国家对这一点还是存在共识的。

提问：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应该由各个国家合作来应对。但是现在不少国家的反应却是由民族主义为主导，采取“以

邻为壑”的手段，没有很好的合作。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目前各国应对疫情的反应是否是近些年来民族主义逆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郑志杰：这次疫情以来，的确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各自为政，甚至相互竞争医疗资源。在此前的“非典”、H1N1 流感以及埃博拉病毒等几个比较重大的国际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社会尤其是学界一直在呼吁加强全球协调，加强国际层面的全面合作，但很遗憾，之前的疫情没有足够大到暴露出这么严重的问题，这次疫情的确暴露出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全球合作的重大缺失和不足。

我们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这其中应该会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但是恰恰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时间中，美国在很多方面削弱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和领导力。美国本来在全球卫生领域起着很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现政府在减少美国作为全球主要的协调者或者领导者的作用。我认为，重大疫情更需要国际合作，没有全球协调一致的努力就无法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这次疫情对各个国家冲击都非常大，我相信接下来在全球层面可能会有更多的反思以及进一步的努力，来加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这一重要的工作。我也认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加强与欧洲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合作，在全球卫生体系以及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一旦有类似重大的突发事件，我们可以更从容地应对。

史明德：我认为加强全球卫生合作是非常必要的。现在疫情震中是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相对来说应对的能力还是很

强的，但如果未来在非洲、拉美及印度这些地区大规模爆发，无论是单一国家还是整个地区都难以应对，只有全球合作才能够应对疫情。但非常遗憾的是，能够起协调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被政治化，经费短缺，形象受损，作用被大大削弱了。

中国现在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但是“及”到什么程度？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所以我认为只能是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的合作伙伴是欧洲，而不是美国。美国不仅退群走了，削弱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现在还要寻找一个按照美国意志行事的替代组织。我认为疫情过后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产业方面，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会更加抬头。

提问：史明德大使提到了德国外长马斯说疫情的防控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请问这是否是德国政府现在的共识？它是否会转换成欧盟对中国抗击疫情这个问题的态度？董教授说我们正在采取“新基建”这种策略，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了，因为我们认为疫情过后对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要花费大量资金，而“新基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它不能保就业，二是它的资金使用效率很低，应该让民企参与新技术的开发。

史明德：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每一个国家都有，是助长还是遏制这种倾向对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抗击疫情方面，我认为我们同欧洲的主流社会和政治家是一致的：我们大家要团结合作，抗击疫情，因为病毒是没有边界的，它也不认社会制度。但是在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同，每个国家做法也不尽相同，大家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应

将这些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我们一定要区分网意和民意。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只是社会民意的一小部分，我们不能迎合这种情绪，应该更多地做合作共赢的事情。我觉得这方面马斯代表的是德国政治家合理的、理性的观点，但是德国的舆论、智库的观点就很多了，能够分清社会治理措施和意识形态产物的人不是很多。我们要用理智对待非理智，虽然国内的非理智的，民族主义、民粹的东西会对外交产生影响，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说，不能被这些方面所引导。

董小英：现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面临着两个问题：生存和发展。从中短期目标看，首先是要生存下来。“新基建”在过去5年、10年一直在做，现在主要是打包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我认为它关注的还是中长期发展的问题：经济未来的方向在什么地方？将来基础平台、整体运作模式、效率应该是怎么样的？也许它会是一二三十年的影响。看待这个问题，不能把生存和发展这两者对立起来。

过去很多互联网企业发展中最有成效的是民营企业，他们的效率更高，变革的积极性更强，而且因为生存压力它必须要让技术真正落地。所以“新基建”最终的主力军还是民营企业，当然像一些国有企业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作为基础骨干企业也会发挥它们的作用。所以我认为不是对立，而是如何实现深度融合，让市场资源得到最佳配置。技术投入的回报是比较长的，需要有战略耐心，也需要社会相关利益群体，以及最适合的行为体参与进来。这个在制度设计和治理机制上都是应该考虑的。

提问：请问董老师，中国和德国相比数字化水平如何？

董小英：数字化应用有两个层面，一个是 C to C，一个是 B to B。实际上在“非典”之后，中国在数字化生存（衣、食、住、行），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应用上，在全球水平都是最高的。由于我们互联网企业大量都是在生活类创业，生活变得更便捷了。但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数字化能力主要集中在企业端，2019 年全球数字经济报告显示中国在这方面与他们相比有较大差距。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推 5G 技术？因为这一技术对于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对远程医疗基础设施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中国要在 B TO B 层面做更多的工作。

提问：美国或西方国家内部那些长期以来支持资本在全球盈利的力量与试图脱钩的力量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

史明德：这个和经济制度有关。资本的逐利是一直存在的，无法改变。政府作用就在于起到限制和调节的作用，这也是美国的自由经济和以欧洲或者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所在。所以在这次疫情的应对中我们也看到，美国历届政府基本上是随着资本的流动而流动，所有的政策更多是考虑资本的利益，而在欧洲或在德国，它要考虑资本的社会效益。西方和西方之间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决策也是不同的。

董小英：我观察到的现象叫做“政治经济学”。可能在过去的全球化过程中是“经济政治学”，资本、企业家是主导性的力量，政府为他们站台。但是这两年特别是这次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号称完全市场经济的美国，还是

日本或德国，当它认为国家利益及自身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政治会发挥更大作用，硬核政府会强有力地插手影响资本，通过它的资源配置来帮助企业做决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变化——政治在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趋势在大的经济体当中是有共性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教授在总结时表示，今天各位专家学者从国际关系谈到中德关系、中欧关系，再谈到德国国情的方方面面，谈论这些话题的同时也促使着我们思考自己的问题。今天各位贡献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关键词，值得我们总结，比如自由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弱信号、线上能力、全球抗疫等等，每一个关键词都代表一个更大的话题，需要我们继续思考，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对这些话题进行跨学科式的思考。